

67

G04
2436

西学东渐与 中日两国的对应

——中日西学比较研究

赵德宇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赵德
宇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6

ISBN 7-5012-1499-9

I. 西… II. 赵… III. 东西文化 - 文化交流 - 对
比研究 - 中国、日本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9147 号

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

责任编辑/罗养毅

封面设计/孙 旻

责任出版/王勇刚

责任校对/王 铮

出版发行/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010)65122235

邮政编码/10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力托科技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展望印刷厂印刷

开本印张/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875 印张 268 千字

版次印次/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国人皆以近代中国为痛史，然痛自何来？西人称誉近代日本为“亚洲之骄子”，“骄子”又缘何而生？对此，人们往往将目光聚集在鸦片战争和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瞬间，或稍后的历史。康有为就曾说过：“泰西以五百年讲求者，日本以二十年成之（指明治维新），盖地球所未有也。”^①这仿佛只看到了一个人的成熟期，而没有注意到他漫长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中日两国近代走上不同的道路，固然有诸多历史原因，但两国近代前夕西洋学^②水平的差异及由此而产生的历史影响应该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鉴于历史自身发展

①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光绪二十四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② 这里为叙述方便，特用西洋学一词涵指中国的西学和日本的洋学。本书所使用的“西学”一词，特指近代以前由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早期西学”。

的这种连续性，本书将把目光延伸到前近代中日两国与西方接触的历史阶段，即对两国的西洋学史作一考察。这不仅因为它们的时间上是两国不同近代史的源头，还因为它们将涉及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理论问题。通观人类文明史，每一次历史性的社会变革无不导源于科学的进步。然而，史学界在宏观探讨重大历史事件及关键历史变革时，往往相对缺乏对科学史的系统研究，甚而疏漏科学的历史作用。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其大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开卷首页就告诉人们：“科学史是人类文明中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书所论述的内容，尤其是日本的兰学和幕末洋学，正是这一论点的具体展开，而中国近代的落后则从相反的方向证明了科学对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

早在13世纪末叶，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就曾把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介绍给欧洲人。他在谈到这两个国家的财富和人口时，经常以“百万”为单位，因而在当时的欧洲，人们将马可·波罗谥称为“百万马可”，而《马可·波罗游记》也被欧洲人揶揄为《天方夜谭》。历史进入15世纪以后，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欧洲人开始反省对《马可·波罗游记》的认识。《游记》中对东方的黄金和香料的描述，开始使欧洲人垂涎欲滴。由于土耳其人控制着传统的欧亚通道，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和商人热望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葡萄牙“航海王子”亨利（Henriqueo navegador, 1394~1460）成为这项事业的强力后援。他设立航海学校，奖励航海事业，并支持葡萄牙探险船队远航非洲，为真正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序幕。

在思想领域，到14世纪，经院哲学衰落了。正在寻找精神向导的新兴资产阶级前驱，力倡古典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学著作。于是，一个搜罗、收藏和抄写古典文献的热潮在意大利国土上兴起。富商巨贾美第奇世家、教皇如尼古拉五世都在资助和奖掖古典文献的搜集与研究。1400年前后，土耳其人对拜占庭帝

国大举进攻，1453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最终覆灭。在这个动荡的世纪中，大批希腊学者带着他们的希腊典籍离开了拜占庭帝国，渡过亚得里亚海，到意大利定居。他们教意大利人学习希腊语，开办了讲授荷马史诗等希腊古典文化的学校，意大利人开始能直接阅读希腊文献了。由此，辉煌的古代世界突然出现在西方人面前。大学里开设了神学以外的“人文学科”，“人文主义”由此得名，这是一种与神学相对立的发现人的思潮。教授这类课程的教师被称为“人文主义者”。古典文化不仅是发现人的向导，而且也是发现世界的向导。正是从古典著作中，从古希腊人的殖民探险活动中，15世纪的航海探险者们获得了鼓舞自己的力量，冲破了基督教施加给人们的对海洋的恐怖。哥伦布认真研究了托勒密的《地理学》，才知道地球是圆的，从而下定了跨越大西洋，开辟去亚洲新航线的决心。^①

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约1450～1487），最先绕过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航抵美洲；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0～1524）绕好望角继续航行，到达印度；1519～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由此以航海实践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历史上关于地平、地方、地圆的争论亦宣告结束。这次航行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页，从此，地球上的人们开始了更广泛的接触。随着西方科学的进步和对地球的新认识，西方文化加速了向全世界的传播。然而，科学的重大发现不一定只为人类带来幸福，西方人对世界各地的殖民掠夺就是地理大发现留下的不光彩的历史记录。但是，对中日两国而言，这一时期的西方势力东渐，更主要的还是为两国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的成果和天主教信仰。

① 这段历史可参阅鲁品越：《西方科学历程及其理论透视》有关章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43年哥白尼发表著名的《天体运行论》，提出了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日心说理论，描绘出一幅新的太阳系图景，从而在天文学领域，打破了一千多年来被教会神学化的托勒密地心说理论的一统天下，为近代科学的天文学奠定了基础。更值得注意的是，哥白尼的理论冲破了神学宇宙观的束缚，使自然科学开始逐渐摆脱神学婢女的地位，揭开了近代自然科学独立发展的序幕。就在同一年，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留斯（A·Vesalius，1514~1564年）发表了《人体结构》一书，将解剖实践看作是医学的基础，指出男女的肋骨都是一样多，纠正了教会所说的男子肋骨比女子多的说法。因而《人体结构》如《天体运行论》一样，不仅在医学界，在思想界也引起了波澜。哥白尼和维萨留斯对中世天文学和医学的叛逆行为，打破了这两个领域的传统信条。这种怀疑主义精神促发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生成。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在于，它不仅仅是哲学思辨的过程，而是首先以科学实验为手段，研究各类科学的具体问题。因而，在科学史上，人们把哥白尼和维萨留斯的这种科学领域的新思维方式，看作是科学革命的象征，而二人于1543年发表的上述著作则被设定为科学革命的开端。

科学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科学成为促进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角。作为近代科学发源地的欧洲文化对地球其他地区的影响在不断地增长。不言而喻，其中西方的科学技术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近代文明发展的动力是科学技术，换言之，西洋近代文化的本质，实际上是以自然科学为内核的文化，即科学文化。而这种科学文化又具有可以被一切文化所接受和融合的普遍性。也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接触。就日本而言，此时才刚刚认识西洋；而中国人在此之前虽曾几度接触西方文化，不过，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似乎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是，16世纪欧洲人再度

东渐，情形却发生了变化。

16~19世纪的世界史表现为西方各国相继实现近代化和亚洲各国的相对停滞。欧洲人在16世纪初期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接下来便是后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产业革命。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欧洲具备了以经济实力和武力打开任何一个欧美以外国家大门的综合实力。在上述世界史背景下，中日两国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状况将决定着两国近代史的发展方向。在此之前，世界各地的发展水平虽参差不齐，但相互间尚未表现出历史阶段性的本质差别。而在16~19世纪的欧洲各国，则相继完成了历史上的革命性飞跃，并且规定了整个世界史的发展方向。如果将西方的这段历史作为参照系，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更准确地把握中日两国前近代的发展脉络。这种视角恐有欧洲中心论之嫌，然而不能否认，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的发展确实走在了前面。如果无视这样的历史事实，而只是从东方人的感情出发去批判欧洲中心论，将是不明智的。我们研究历史，更具体地说，我们中国人研究历史，就是要理清我们先人的历史活动的来龙去脉，汲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我们所面对的历史前提。只有这样，才能面对现实，并寻找到自身的正确发展道路。

随着西方的崛起和向全世界的扩张，西方文化也迅速地扩散到整个世界。在这一扩张和扩散的潮流中，葡萄牙人于1517年来广州要求开展贸易，于1543年到达日本南部的种子岛。此后，1549年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1506~1552）赴日，1582年同为耶稣会士的利玛窦（Ricci Matteo，1552~1610）来华。从此，中日两国便开始面临汤因比所说的“西方问题”了。

汤因比曾就美洲和远东在这一时期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作过比较，他认为：“这两种情况终于有极为不同的结局。在应付困难局面时，正如那些远东文明是成功的那样，那些美洲文明是不成

功的。”^① 汤因比是站在人类宏观比较文明史研究的角度得出上述结论的。然而，如果具体地追溯中日两国的这段历史，却并非像汤因比所说的那样简单。笔者以为，西方文明对远东的“第一次冲击”^② 应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自 16 世纪中叶西方文明东来至 18 世纪前期为第一阶段，18 世纪前期至 19 世纪中叶为第二阶段。

在第一阶段，总体看来，中国明末清初的历代皇帝以及部分士大夫曾极力摄取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传教士也采取了较为公允的态度。由此，为明末清初科学技术的发展添加了丰富的养料。在日本，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也曾一度辉煌，但日本人所摄取的主要是西方的天主教文化。诚然，在日本也并非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不闻不问，而中国也同样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天主教徒，但从宏观而论，两国对西方文明的这两个方面的侧重，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且西方文化最终因德川幕府的厉行禁教，在日本几近销声匿迹。从吸收外来文化角度看，第一阶段的日本是不成功的，而中国则成功地迎接了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

然而在第二阶段，中日两国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却出现了相互逆转，而这个逆转对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历史影响。在日本，由于 1720 年对汉译西书的开禁，到 18 世纪后半期，便兴起了通过荷兰语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兰学运动。兰学塾遍布日本各地，培养了为数可观的兰学人才，从而使日本大体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的成果。随着兰学研究的深入，日本人开始

① 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8 页。

② 汤因比语，指 16 世纪中叶至近代前夕中日两国与西方文明接触的历史，而将 19 世纪中叶开始的西方以武力为后盾闯入远东看作是“第二次冲击”。参阅汤因比著，沈辉等译：《文明经受着考验》下卷第四章《远东与西方》，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认识到西洋社会原理的先进性，并逐渐滋生出抨击封建社会的社会批判意识。由此，日本依靠百余年对西方文化的积累，在幕末维新时期，较顺利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自1720年前后，由于清廷禁止天主教和康熙皇帝去世等历史原因，客观上造成了中国西学的势微，从而蹉跎了这一关键的时代。

至19世纪中叶，在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西方殖民者面前，中国西学的先天不足便立时暴露无遗了。当时能掌握西方科学并具有西方知识的人才寥寥无几，徐光启时代的科学精神已不复存在，而且对世界发展大势也所知无几。至鸦片战争前夕，虽有林则徐等有识的士大夫积极学习西方，终因缺乏对西方知识的积累，未能从根本上理解西方的社会原理，结果收效甚微。由于在相对和平的时代不去了解进而吸收先进的西方文明，到了近代就不得不被迫全面接受西方的所有原则，包括殖民者强加于中国人的弱肉强食的原则，致使中华民族不得不遭受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一个世纪”。作为中国史学工作者，绝不应忽视这一反一正、发人深省的历史。

16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人的东渐，是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向全世界扩张以来，与远东接触的端绪。由此，开始了中日两国有史以来与西方文化最大规模的接触，“欧亚大陆两极基本上是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两种社会在历史上首次开始了真正的交流”，^①从而形成了中日两国的西洋学。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段中日西洋学史，即近代以前的中国西学和日本洋学的历史。

西学是明末及清代前期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总称。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曾著《西学凡》，其他传教士所翻译或编写的有关西方知识的书籍也多有以“西学”命名者，如《西学修身》、《西学持家》、《西学治平》等，西学一词遂成为包

① 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括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代称。又由于耶稣会士试图以中国“天”的概念来比附天主教的神，因而也称有关天主教的知识为“天学”，有时“天学”也泛指包括西方科学技术在内的西方学问。西学在时间上的延续过程是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直到18世纪后期，而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则以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为主体。这些传教士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将以天文历算为主兼及地理学、力学、光学、科学仪器、水利、测量、机械、兵器、解剖学等西方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而且随着天主教的传播，西方的古典哲学、逻辑学、伦理学、语言学等也逐渐传入中国。西学可以粗略地划分为明末西学和清代西学两大时期。这种区分不只是因为朝代的不同，而且就吸收西方文化的主体、动机、规模而言，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明末中国，内忧外患并显，促发了开明士大夫阶层的实学风潮，而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恰好与这股实学风潮合流。由此，西方科学在晚明中国迅速传播。在士大夫阶层中出现了以“西学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首的一批西学家，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西方科学的高潮。热中于西学的士大夫痛斥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浮夸学风，提倡“经世致用”、“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其实”。^①梁启超曾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说：“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数百种……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②由于明末西学的主要媒介是士大夫阶层，因而也可称这一阶段的西学为“士大夫西学”。

明清嬗代以后，清初顺治、康熙等帝王也对西学显示出浓厚

① 方中通：《物理小识·编录缘起》，载《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867册。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页。

的兴趣。清朝入关之初，即因推崇在华耶稣会士汤若望于天文历法领域的成就，任命其为钦天监监正，并将传教士请入宫中作科学教师。在这一阶段，有科学造诣的耶稣会士大多被召至宫中，成为满清帝王的科学顾问。传教士们的其他科学活动，如制作《皇舆全览图》的测量工作等，也是直接听命于皇帝。而且从事西学的主体，也仅仅是传教士，因而其影响没有能像明末那样辐射到士大夫社会。在民间虽有少数西学家，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西学主要还是出于帝王对西学的兴趣，基本上被限定在宫廷。因此，清代西学，也可称为“宫廷西学”或“御用西学”。

洋学指16世纪中叶至明治维新止，日本人接触、学习、移植、研究西洋事物的总称。其间可以分为各具明显特征的三个阶段，即南蛮学、兰学和幕末洋学。洋学一词在日本学界大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严格地讲，广义洋学包括以上三个阶段，狭义洋学特指幕末洋学。但在日本学者的论著中，又习惯将兰学和幕末洋学统称为洋学。为行文方便，本书在使用洋学一词时也间或采用这种习惯用法。

南蛮学也称作南蛮文化。1543年的“火枪传来”和1549年沙勿略来日本，即“天主教传来”，揭开了南蛮文化的序幕。当时日本人援用中国人的蛮夷观念，将东南亚一带视为南蛮之地，而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从西海而向南方往，自南方向北而来于日本，故倭国人称之为南蛮人”。^①由此，“南蛮人”带来的西方文化便顺理成章地被称为南蛮文化。又由于这种文化是随着天主教传教活动而传入日本的，因此也称其为“切支

^① 雪窗宗崔：《对治邪执论》，载《日本思想大系》25卷，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492页。

丹文化”，^①即天主教文化。这段日西文化的接触，除天主教的世界观、伦理道德观外，也涉及一些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至生活方式等内容，故日本学者又总称其为南蛮学。南蛮文化时代最终以德川幕府于1639年的厉禁天主教，并根绝与葡萄牙人的往来而告结束。

兰学指18世纪后半期至1853年日本开国为止，日本人以荷兰语为媒介，吸收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学问。它以研究西方近代科学为开端，逐渐扩展到研究西方社会思想等领域，成为江户时代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中介。德川幕府驱逐天主教和葡萄牙人以后，并没有彻底割断与西方的联系，但是，洋学研究的媒介由以葡萄牙为后援的耶稣会士变为以经商为本业的荷兰人。起初，由于作为了解西方事物媒介的多是由南蛮通辞转为荷兰通辞的翻译人员，因而他们所具备的西方知识明为兰学，实际是南蛮学与兰学的相互交叉。明确地称西洋学问为兰学，是从1774年杉田玄白等人译成《解体新书》开始的。兰学时期传入日本的西方文化，不再附随西方宗教的因素，而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世俗文化。它以西方的医学和天文学为主导，基本上囊括了西方近代科学中的物理、化学、地理学等主要科学成果。随着对西方理解的加深，兰学研究进一步扩展到西方的社会思想领域。

幕末洋学的时间断限为1853年日本开港至明治维新这一历史阶段。日本开国以后，英、法、德、俄等国近代学术体系相继传入日本，兰学的表述已经无法涵盖这些内容，因而将这一时期的西方学问称为幕末洋学。幕末洋学不同于兰学之处在于，从知识来源看，由荷兰语书籍扩大到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多种

^① 葡萄牙语 cristão 的音译。开始时音译为“吉利之丹”，后因避讳德川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吉”字，改为“切支丹”，在日语发音中，“切”与“吉利”都读作キリ。另一种说法认为是为避讳丰臣秀吉的“吉”字而作“切支丹”。

语言资料。从研究领域看，它明显偏重于西方的军事科学，更扩及西方社会科学和政治思想，并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实践。简而言之，兰学主要是通过荷兰语学习、研究西方近代科学的学术活动，而幕末洋学则是全方位地学习西方各国近代科学及思想，并应用于实践的社会运动。

笔者之所以将这一时期的中日西洋学并为一个课题进行研究，是因为它们在宏观上显示了共性。如前所述，随着西方的发展和西方势力向远东的扩展，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学习西方先进事物，尤其是西方近代科学已成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西洋学的历史，无论在时间上（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还是在内容上（学习西方文化）都可作为同一个历史时期或者说是同一时代来看待。而另一个方面，从上述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在时间上西学与洋学的不同阶段出现相互交错，在传播西方文化的媒介以及学问内容等方面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而两者在宏观上的共性和具体内容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正是本书的切入点。笔者的思路是：援史料为据，总体上沿着时间顺序，深入到中日两国西洋学史的具体史实中，通过分别理清西学和洋学的总体脉络，显现它们的异同以及对两国近代所产生的各自不同的影响。即所谓：察清经纬，究明原因，论其结果，成一史鉴。

目 录

序

第一章 日本的天主教时代 1

一、东来耶稣会士论	1
1. 传统定说的盲点	1
2. 文化传播的使者	6
3. 适应策略的端绪	9
二、天主教风行日本	12
1. 时代的产物	12
2. 范礼安方案	16
3. 福音的魅力	20
4. 利益的诱惑	23
三、天主教受挫日本岛	28
1. 风云突变的疑案	28

2. 集权统治的障碍	31
3. 文化伦理的冲突	36
四、南蛮科学述略	42

第二章 在华耶稣会的变异

一、传教士的迂回战略	50
1. 艰难的入华史	50
2. 利玛窦的包装	55
3. 科学的穿透力	62
二、仇教者的破邪风潮	68
1. 明末南京教案	68
2. 清初历法之争	74
三、中国人的理性抉择	78
1. 教义——同床异梦	80
2. 科学——买椟还珠	87
3. 冲突——有惊无险	92

第三章 西学理路

一、历史机缘	97
1. 经世致用	97
2. 洋为中用	102
3. 宫廷御用	107
二、西学成果	111
1. 译述概观	111
2. 历算天文	114

3. 世界舆地	119
三、西学定位	124
1. 历史坐标	124
2. 崇祯历书	127
3. 山海舆图	133
四、西学萎缩	140
1. 礼仪之争	140
2. 西学中源说	147
第四章 兰学历程	152
一、锁国论辨析	152
1. “锁国”流变	153
2. “锁国”目标	157
3. 禁书实情	159
4. 《荷兰风说书》	162
二、兰学的兴盛	164
1. 社会前提	164
2. 兰学网络	172
3. 鸣泅学塾	179
三、兰学的触角	183
1. 科学领域	183
2. 社会思想	186
3. 幕府与兰学	191
四、西学与兰学之差异	195
1. 科举制与身分制	196
2. 上层西学的局限	199

3. 语言工具的作用	202
第五章 历史错位	207
一、西方文明观的逆转	208
1. 禁教与求师	208
2. 再兴与萎缩	211
3. 紧迫的时代	214
二、林则徐与渡边华山	218
1. 林则徐的西洋知识	220
2. 渡边华山的西洋观	224
3. 差异的原因	229
4. 不同的影响	234
三、幕末风云中的洋学	237
1. 洋学骤兴	237
2. 幕藩洋学	239
3. 议政洋学	243
四、中日近代史的宿命	248
附录1《西洋学家译述目录》	256
附录2 江户时代世界史地文献年表	268
附录3 中日西洋学史对照年表	291
参考书目	310
中文部分	310
日文部分	319
后 记	326